

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高等院校文化产业基础教材”，是由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系成立伊始即已启动，历时多年方才完成的一套大学本科基础教材。首批推出的六种分别是：《文化产业概论》、《文化产业管理学》、《文化资源学》、《文化文献导读》、《文化产业知识产权》、《文化产业管理案例》。这六种教材所对应的都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从最初的筹备到出版，历时近10年。同时，这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由教师完成的本科基础教材。此外，这套教材也非常注重与山东大学一线教师、某些具有特色的理念。我们的共识有四点：1. 认为“文化”可以追溯久远，但“产业”意义则从近代“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一种产业形态。它提供了强大的能源动力，如留声机、照像机、印刷机、播放器、摄影机等可以把一件文化产品按产业的需求量复制，火车、轮船、飞机又是以把海量文化产品的营销链条无限延展。正是伴随着工业文明体系的建立，才产生了真正产业意义上的现代文化产业。2. 认为“农业文明”关联的只是“文化产品”，“工业文明”关联的是“现代文化产业”，而数字技术关联的则是“当代文化产业”。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的最大影响，就是使文化产品彻底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从而创造出巨大的利润，“文化产业”也因此而成为“朝阳产业”、“黄金产业”，或“最后一块暴利蛋糕”。但是，这也同时提醒我们，不能笼统地把“文化产业”认定为“朝阳产业”，只有数字技术所催生的“当代文化产业”才是“朝阳产业”。从这一意义上说，以“三屏产品”（电视屏、网络屏、手机屏）为代表的数字文化产业，应该成为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第二，关于文化产业的公众认知和理论导向，我的共识有四点：1. 认为“文化、创意、财富”是文化产业的三个最为本质的表达元素，也是“文化产业”最通俗、最平实的诠释。2. 认为“文化”经过“创意”而产生“财富”，这之间并不存在“阿里巴巴”式的神话，存在的永远是《资本论》中所描述的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而且，与工业、农业相比，文化产业的市场需求是“弹性”而非“刚性”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一产业更大的风险性。因而在宣传文化产业是“黄金产业”、“最后一块暴利蛋糕”的同时，更应突出“文化产业的高风险性”这一往往被忽视的观点。3. 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文化”始终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普及、提升文化的意义，又始终包含着强烈的“反文化性”。4. 高度认同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最大特点和最优势所在”。2002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在大会报告中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部署。2003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的李铁映撰文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和灿烂的文化，其文化累积之丰厚，文化形态之多，文化哲学之深刻，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少有的。这是怎么估价也不过分的宝贵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中国新兴的文化产业来说，启动并整合包装这些文化资源，就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并在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占有可观的优势。”这于中国文化产业优势与特征的科学认识，至今仍然具有强烈的导向意义，当下中国文化产业最现实、最积极的发展策略就是如何将“历史文化资源大国”变为“文化产业强国”。这其中，历史文化资源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方向。第三，关于近30年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学理建构”和当下的学科建设，我们的共识有三点：1. 认为“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在近30年的中国出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转译，它的生成，可以直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对知识分子地位的认定：由于当时知识分子已从“臭老九”跃升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于是各个“知识部门”，如教育、文化部门等，也就与农业、“工业”一样，成为

高等院校文化产业基础教材

WENHUA CHANYE

丛书主编

王育济
韩英

Wenhua Xue Gaigao

文化学概要

王晓鹏 编著

海外借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丛书主编 王育济 韩英

文化学概要

王晓鹏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学概要/王晓鹏编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7. 6

高等院校文化产业基础教材/王育济, 韩英主编
ISBN 978-7-211-07654-3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文化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3386 号

文化学概要

WENHUAXUE GAIYAO

编 著: 王晓鹏

责任编辑: 江叔维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 19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66 千字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7654-3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2004年1月，教育部新设“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为全国首批承担这一专业的四个院系之一，并于当年实现了本科招生。次年春，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系成立。

任何一门学科的基础与范式，都只能建立在对研究史的总结之上，这是学科建设的第一块基石。山东大学已故史学名师郑鹤声先生有言：历史系每成立一个教研组，其首要工作必是整理学界相关著述之索引。基于这种办学传统，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系成立伊始，即会同历史系、档案系、考古系等，着手基础资料库的建设，并渐次启动《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1979—2008年各卷的编纂工作。《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按学术编年史的框架，通过“年度学术论著选编”“评价集成与结论”“研究总目索引”等形式，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的编纂工作历时7年，出版后获得学术界、文化界的广泛好评，被认为是“涵盖了近30年相关领域中最完整的学术信息和最丰富的理论内容，既包括文化产业的概念、定义、逻辑内涵、行业边际、学科特点等学理方面的研究，又包括中国文化产业的历史、现状、行业模式、区域布局、新兴业态、业内典范等方面的宏观理论、政策和案例研究……近700万字的各类索引，更是为文化产业的学术理论研究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海量资讯”（《光明日报》2010年3月31日）；产业界、政府管理层，甚至央视《新闻联播》等，也对这套历时7年而成的学术年鉴给予了特别关注。

与《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相类似，现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高等院校文化产业基础教材”，也是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系成立伊始即已启动，历时多年才完成的一套大学本科基础教材。该教材所对应的都是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从最初的备课教案、自编讲义开始，经历过2004年至2012年间的若干轮授课实践和若干轮修改。

同时，这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套由同一个院系的一线授课教师完成的本科基础教材。因而，除了相对严谨、扎实之外，这套教材也非常适合大学本科教学。

作为一套完全由山东大学一线授课教师所完成的教材，自然还会表现出某些“山大特色”，即山东大学师生有关文化产业的某些共识性的理念。

第一，关于“文化产业”自身的发展历程，我们的共识有两点：

1. 认为“文化产品”的历史可以追溯久远，但“产业”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则是现代“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一种产业体系。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能源动力，如留声机、照相机、印刷机、播放器、摄影机等可以把一件文化产品按产业的需求海量复制，火车、轮船、飞机又足以把海量文化产品的营销链条无限延展。正是伴随着工业文明体系的建立，才产生了真正产业意义上的现代文化产业。

2. 认为“农业文明”关联的只是“文化产品”，“工业文明”关联的是“现代文化产业”，而数字技术关联的则是“当代文化产业”。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的重大影响，就是使文化产品彻底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从而创造出巨大的利润，“文化产业”也因此而成为“朝阳产业”“黄金产业”，或“最后一块暴利蛋糕”。但是，这也同时提醒我们，不能笼统地把“文化产业”认定为“朝阳产业”，只有数字技术所催生的“当代文化产业”才是“朝阳产业”。从这一意义上说，以“三屏产品”（电视屏、网络屏、手机屏）为代表的数字文化产业，应该成为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第二，关于文化产业的公众认知和理论导向，我们的共识有四点：

1. 认为“文化、创意、财富”是文化产业三个最为本质的表达元素，也是“文化产业”最通俗、最平实的诠释。

2. 认为“文化”经过“创意”而产生“财富”，这之间并不存在“阿里巴巴”式的神话，存在的永远是《资本论》中所描述的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而且，与工业、农业相比，文化产业的市场需求是“弹性”而非“刚性”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一产业更大的风险性。因而在宣传文化产业是“黄金产业”“最后一块暴利蛋糕”的同时，更应突出“文化产业的高风险性”这一往往被忽视的观点。

3. 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文化”始终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普及、提升文化的功能，又始终包含着强烈的“反文化性”。

4. 高度认同“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最大的特点和最大

的优势所在”。2002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在大会报告中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部署。2003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的李铁映撰文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其文化累积之丰厚、文化形态之多样和文化哲学之深刻，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少有的。这是一笔怎么估价也不过分的宝贵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中国新兴的文化产业来说，启动并整合、包装这些文化资源，就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并在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占有可观的优势。”这些关于中国文化产业优势与特征的科学认识，至今仍然有着强烈的导向意义，当下中国文化产业最现实、最积极的发展策略就是如何将“历史文化资源大国”变为“文化产业强国”。这其中，历史文化资源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方向。

第三，关于近30年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学理架构”和当下的学科建设，我们的共识有三点：

1. 认为“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在近30年的中国出现，并不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概念的简单转译，它的生成，可以直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对知识分子地位的认定：由于当时知识分子已从“臭老九”跃升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于是各个“知识部门”，如教育、文化部门等，也就与“农业”“工业”一样，成为“一种生产部门，一种产业部门”。正是在这种理论思维的推动下，“第三产业”的概念在1980年前后即为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第三产业”作为一个包含着“知识生产”在内的术语，又直接导致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的生成。因而早在1981年就出现了“文化的产业化”的说法，出现了“第四产业”与“精神经济学”之间的讨论，至1987年就出现了“文化产业”的概念。尽管当时尚无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定义，但是这一概念所具有的“望文生义”的优势十分明显，与中国传统思维的路数亦十分吻合——无需定义和解说，即可粗知内涵。正因如此，“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才能超越“第四产业”“精神经济学”，以及后来的“文化工业”“创意产业”“内容产业”“版权产业”等外来概念，被中国学术界和社会普遍接受。“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在中国首度出现的时间是1987年，远早于20世纪90年代末才为学界所引介的“文化工业”，因而“文化产业概念的内生性”，是近30年来中国文化产业理论最重要的“学理性起点”。

2. 认为作为国家战略层面上的文化产业发展起始于近十年，但关于文

化产业的学术研究则贯彻于近30年。其中重要的节点是：1979年以来经济学界关于“精神产品”和“知识价值”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关于“第三产业”“第四产业”“精神经济学”“文化市场”“文化个体户与经纪人”“文化搭台与经济唱戏”“大众消费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产业”概念的首度出现，以及20世纪90年代有关“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版权产业”“文化经济学”“文化管理学”的诸多讨论；2000年以来关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讨论，以及党的十六大以后国家战略层面上的文化产业研究；等等。对这些节点进行整合性梳理，可以为当下中国文化产业学科奠定坚实的基石，也是创立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必由之路。

3. 认为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作为教育部新设的一个十分年轻的应用型专业，就其人才培养目标而言，可以简单表述为：既要有纵贯古今的文化视野，也要有策划经营的文化理念，以及现代产业意识和经营思路的复合型人才。但就课程的设置和教学的重心而言，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显然应该与具体的工艺美术设计、图书编辑出版、游戏创意、景区规划，以及演艺产业、广告产业、体育产业、旅游产业等有所区别。所以，在文化产业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中，应该突出“通识意识”“学问意识”和“经典意识”，要从学术史的梳理中奠定这一应用学科的学理基础；要引导学生关注工业革命以来有关“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的经典文献，关注近30年来中国学术界在文化与文化产业问题上的深度思考，从而保持大学教育应有的内在思想的活力、反省能力、质疑能力和价值动力。换言之，“文化产业”这一学科所面对的问题可能非常现实、非常政治和非常经济，但大学教育和学科建设仍应该与“现实”“政治”“经济”拉开距离，要努力建立并坚持大学自身的学术话语，并依据大学应有的治学逻辑设计学科建设的路径。

以上理念和观点主要体现在《山东大学关于增设“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的建议报告》（2003年）、《山东大学关于建立山东省文化产业研究基地的论证报告》（2003年）、《培养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合格人才》（2004年）、《文化产业：学术阐释的原则与目的》（2006年）、《加强文化产业的基础理论研究》（2006年）、《文化·创意·财富：三论“文博会”主题词》（2006年）、《论文化、创意、财富三者之间的关系》（2006年）、《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几点认识》（2006年）、《也谈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2006年）、《1987：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节点》（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学术

年鉴 2003—2008 年卷出版说明》（2009 年）、《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 1979—2002 年卷特别说明》（2009 年）、《文化产业学科建设要有四大意识》（北京大学第七届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主题发言）（2010 年）、《济南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济南市政策研究室委托课题结项报告；文化部基层文化干部培训班讲义）（2012 年）、《数字技术与当代文化产业》（济南市第三届青年科学家论坛主题发言）（2012 年）等相关文献和著述中。山东大学的各位同仁在教学和研究中对这些方面的问题思考和讨论也较多，所形成的共识也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渗透、沉淀在这套教材的相关章节之中。这也使得这套教材有了一些区别于其他著述的显著特色。

这套“高等院校文化产业基础教材”的出版，得益于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全力支持和赖炳伟先生的促成，从选题调研、审定编写提纲、编稿到今天的付梓，时间已过去了一年多，这期间，赖炳伟先生以及责任编辑们的工作热忱和辛劳，感动了我们每一位作者。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努力，这套教材可能还会以内部讲稿的形式存在若干年。

《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1979—2008 年各卷的编纂和这套教材的出版，大致夯实了山东大学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基础，但能否在这一基础上更筑层楼，显然还有待更多的努力。

是为序。

王育济

2012 年 8 月 23 日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学的形成、发展与学科建设	(001)
第一节 文化学的形成与发展	(001)
第二节 文化学在中国	(007)
第三节 文化学的研究内容	(010)
第二章 什么是文化	(016)
第一节 文化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016)
第二节 文化的定义	(019)
第三节 文化的特征	(028)
第四节 文化与文明	(039)
第三章 文化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046)
第一节 文化的系统性	(046)
第二节 文化的结构	(054)
第三节 文化符号	(062)
第四节 文化功能	(073)
第四章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081)
第一节 文化的形成	(081)
第二节 文化的传播	(086)
第三节 文化圈层	(096)
第四节 文化传统	(101)
第五章 文化的类型和模式	(110)
第一节 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	(110)
第二节 世界主要文化类型概述	(117)
第三节 文化的整合与多元化	(126)
第六章 近现代文化研究与文化学 (上)	(131)
第一节 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研究	(132)



第二节	欧洲文化传播学派的文化研究	(141)
第三节	历史哲学中的文化研究	(144)
第四节	社会学中的文化研究	(150)
第七章	近现代文化研究与文化学（下）	(158)
第一节	20 世纪的心理学与文化研究	(158)
第二节	文学艺术理论（批评）与文化研究	(165)
第三节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	(174)
第四节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	(177)
第五节	20 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研究	(180)
第八章	文化学的应用领域	(185)
第一节	文化与经济	(185)
第二节	文化与管理	(201)
第三节	文化与艺术	(215)
第四节	当代人的文化生活与生存发展	(225)
第五节	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软实力	(230)
主要参考文献		(239)
后 记		(247)

第一章 文化学的形成、发展与学科建设

第一节 文化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文化学形成的来源和路径

文化学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是一门在全世界范围内新兴起的综合性基础学科。从“文化学”术语的产生到早期文化学学科观点的提出，再到现当代文化学构建思路的兴起，文化学的形成历经一百多年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坎坷起伏，发展并不平稳，而其形成的来源和路径也较为复杂。由于早期的文化学是从其他学科孕育而出的，所以曾一直受制于其他学科，而未能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尽管如此，在当今时代，文化学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是必然趋势，它的产生和发展对于文化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具有重大意义。

“文化学”概念是 19 世纪提出的。1838 年德国学者列维·皮格亨首次提出“文化科学”一词，1843 年 C. E. 克莱姆又提出“文化学”一词，传出了西方文化研究者希望建立专门的文化科学的强烈呼声。

而较早将文化的研究与其学科构建思想结合起来并付诸实施的重要途径是文化人类学，也就是说，早期文化学形成的重要来源是文化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主要分支学科。人类学，译自英语 anthropology，由希腊文 anthropos（意思是“人”）和 logia（意思是“系统的研究”或“科学”）构成，是一门研究从史前时代到当代人类的体质和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的学问。这种通过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来研究人类的学科，后来发展出了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或史前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志及应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美国的习惯称谓，在英国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在

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则称为民族学,^①而我们通称为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兴起,标志着人们对文化现象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②

19世纪70年代,欧洲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学派——古典进化论学派,为早期文化学观点的产生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该学派的代表、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初步提出、探讨了文化学问题,成为早期文化学的奠基人。1871年,爱德华·泰勒在其名著《原始文化》中将“文化科学”这一概念从德语引入英语,并给“文化”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原始文化》被公认为是近代科学意义上第一部研究人类文化的学术专著,同时也被视为文化学的奠基之作。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是文化人类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几十年里先后出现了众多学派——如传播论学派、功能学派、结构主义学派、美国历史文化人类学派、文化心理学派和新进化论学派等,均以文化研究为己任。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主要对人类的各种民族或群体的社会与文化体系进行研究,通过考察、比较各种社群或部落的文化,探寻其文化的特性与通则性。文化人类学家特别注重人类各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强调人类的种族和文化特点,对千百种社会群体或聚落进行了实地考察与描述,这些宝贵的调查成为文化学研究的重要资源。文化人类学家进行的种种理论与方法探讨,成为文化学理论的基础之一,是文化学构建的一个重要来源。正因为如此,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一直认为,文化学与文化人类学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名称不同而已。^③甚至有许多学者一直把文化学看成是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分支。

但事实上,从当代的学科体系来看,文化学与文化人类学不仅名称上有差异,研究范畴和研究目标等方面也同样存在着差异。文化人类学“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的学科”,^④其研究对象是“文化与人”,即通过探究人所创造的各种文化现象去揭示人类各民族或各群体的社会特色和文化特色。而文化学则是研究文化原理的学科,即通过考察文化现象来探讨文化的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特征,研究文化的共性与个性、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等原理问题;文化学还探究人们对文化问题的认识与研究水平,探究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解决文化研究的元理论问题。除了与文

① 陈华文:《文化学概论》,16—1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② 林坚:《文化学研究的状况和构架》,《人文杂志》,2007(3),88页。

③ 陈华文:《文化学概论》,2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④ 林坚:《文化学研究的状况和构架》,《人文杂志》,2007(3),88页。

化人类学在研究范畴和目标上不同之外,从形成路径看,文化学得以逐渐形成的重要基础不限于文化人类学,还有其他一些学科。

东、西方探讨文化问题的历史悠久,但近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始于18世纪。1725年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新科学》出版,开创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此后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和孔多赛等人从历史学和历史哲学角度探讨文化问题。而在德国,19世纪晚期出现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十分注重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与分界问题,代表人物有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德、卡西尔等。其中李凯尔德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强调价值凌驾于一切存在之上,认为文化与自然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文化是永远具有价值的,自然则与价值毫不相干。他认为文化科学是以历史为基础、以价值观为导向的科学——虽然这种“文化科学”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学”是不同的概念,但两者联系十分密切,“文化科学”思想的提出对于后来构建文化学理论具有积极的作用。德国学术界的另一个倾向是以哲学家赫尔德和文化史学家克莱姆、布克哈特等为代表,对于文化的启蒙作用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并着力解决民族和传统、社会和生产与文化关系的问题。

与此同时,科学界的大师们如德国生理学家、物理学家 H. 赫尔姆霍茨和德国化学家、思想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F. W. 奥斯特瓦尔德等,也热情关注着“文化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界定问题,对“文化”的范畴进行了一些研究。F. W. 奥斯特瓦尔德明确提出建立一门独立的“文化学”。他在1909年发表了《文化学之能学的基础》(又译《文化科学的唯能论基础》),提出:“把人类种系与全部其他动物物种区别开来的这些独特的人种特性,都被包括在‘文化’一词之中。因此,对这门关于人类特殊活动的科学可能最适于称作文化学。”1915年奥斯特瓦尔德还在《科学的体系》一文中把科学分为阶(逻辑或数学)的科学、能的科学、生物科学,主张将文化学与社会学区分开。^①

19世纪欧洲文学批评理论兴起,直面社会和文化问题。英国文学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是文化批判的先驱,其理论传统发展为后来的利维斯主义文化批判和英国文化研究,直至20世纪英国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此外,19世纪末至20世纪兴起的欧美现代文艺理论和现代派思潮从根本上

^① 王玉德:《文化学》,27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冲击了传统文化艺术，触及文化发展观念的实质问题。这一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也迅猛发展，大多涉及文化研究。至20世纪中叶，西方已涌现出许多文化思想者，他们从文化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符号学、心理学、美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对文化研究做出了贡献。他们的理论和思想无疑成为文化学构建的重要基础。

总体来看，早期文化学的产生主要源于文化人类学、历史哲学和史学。同时，哲学、社会学、文学和文艺批评理论、美学、符号学、心理学等学科在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对于文化学的形成也起到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但是，从早期文化学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到：由于在理论来源上深受其他学科影响，特别是深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所以当时人们努力构建的所谓文化学，实际上在理论思路和研究方法方面都一直未能超越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范畴，因而也就一直未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学科。

二、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化学的再度兴起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学兴起于20世纪40、50年代。194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一书里又重新提出了建立一门独立的“文化科学”的构想。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他写道：“随着科学领域的拓展，从心理与社会现象中划分出另一类现象。它被那些发现和分离出它的人们命名为‘文化’。对于事件的这个独特类别的分析说明，被称为文化的科学。”“文化的科学若不是文化学，又能是什么呢？”^①怀特虽然把文化学（culturology）定义为文化人类学的分支，但是通过分析其著作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倡导的文化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已经超出文化人类学的范畴。在《文化的科学》中，怀特梳理了以往主要的文化学说，探讨人类创造文化的共性和普遍规则。他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是一个有其自身生命和自身规律的自成一格的体系，这一体系包括技术工艺、社会和意识形态三个分体系。通过阐述人类文化整体的体系机制，他试图揭示文化的普遍进化过程，即人类社会为满足其多种功能需求而产生多种行为规范的进化过程。怀特还阐明了将文化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理根据，从科学发展史和科学方法论角度论证了创立一门独立的文化科学的必要性，他说：“文化学是科学的最新尝试。

^① [美] L. A. 怀特著，沈原、黄克克、黄玲伊译：《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393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对文化的说明是而且必须是文化学的解释。”^① 怀特初步提出了他的文化学原理和研究方法，从而为现代文化学的兴起提供了理论条件。此后，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逐渐跻身于现代人文社会学科之林。由于怀特对创立文化学有特殊贡献，因此文化学界称他为“文化学之父”。

同一时期，美国文化学家 A. L. 克罗伯也着力构建现代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成为现代西方文化学的创建者之一。他认为文化是一种构架，包括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因此，他相信有必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文化学，来研究人类的这种独特的现象。他提出了关于文化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并提倡将文化学置于科学体系的金字塔顶端。克罗伯还认为，一切文化都是由其原型文化所决定的，人类的创造性行为无不受给定文化系统的制约，这就是他提出的“文化决定论”。他主张文化是“超机体”的，反对把文明史上的伟大发明或发现解释为天才个人的产物。他注重“文化模式”的研究，认为文化应包括行为的模式与指导行为的模式。他还把文化模式分为两种范畴：一种是基本模式，可绵延数千年并起重要作用；另一种是次级模式，稳定性差而易变。基本模式面对现实，次级模式面对价值。他注重从语言研究文化，把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克罗伯还十分注重文化史研究，出版了《文化成长的形貌》《文化发展的结构》《文明和文化》等著作。这些专著论及古代至现代各个主要阶段的文化形貌和结构，对人类的各种文明的特点做了比较分析。^②

1952年，克罗伯与克拉克洪合著了《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书，被称为关于文化的“大型的历史编纂学汇集”。克罗伯与克拉克洪对文化学的核心概念“文化”的定义进行了充分的、详尽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较有影响的“文化”定义。

克罗伯是博厄斯的学生，原本是一位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但是他在文化研究上不拘泥于学科和流派，而是超越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范畴，总结分析了以往的文化理论，探讨了自泰勒以来文化概念的发展，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元理论性研究，具有相对独立的文化学研究范式，从而有别于过去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中的文化研究。因此，他的文化研究属于真正现代意义的文化学范畴。

^① [美] L. A. 怀特著，沈原、黄克克、黄玲伊译：《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37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② 王玉德：《文化学》，27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在莱斯利·怀特和克罗伯等人的倡导下，欧美学术界再次兴起文化学研究的热潮。随后，文化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了转变：一是从以往研究历史文化形态、注重考古发现和对具体民族或原始部落的调查研究，逐渐转变为对现代社会文化的普遍现象的研究；二是开始将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和文化理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形成了梳理文化概念和综合分析各种文化理论成果的学术取向。

在欧美文化学再度兴起之后，苏联的文化学研究也有较大进展。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苏联社会科学界把文化理论问题（包括人的学说、价值学说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模式、文化发展规律及文化学系统方法等）作为“迫切问题”加以研究，他们从西方引进“文化学”术语，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学学科。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一步推进文化学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理论研究新成果。

构建现当代文化学，需要探索文化的基本原理，而梳理和总结各种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成果则是必不可少的。多学科、多学派的文化研究成果汇入文化学研究领域，文化学以其元理论的综合视野，分析、总结这些成果。纵观20世纪，西方文化研究呈多元化之势，众多学科和学派纷纷卷入其中，如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代派、精神分析派、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文化学派、女权主义、东方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跨学科的文化批判思潮等竞相登场。这些学派和思潮虽然在文化研究方面各持己见，但却不约而同地关注着当代社会的文化问题。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对于文化问题的综合研究，已成为当代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趋势。如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第9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第11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第19届世界历史学大会，都以文化问题作为会议主题。^①可以说，关注当今世界，探究社会文化的现实意义，已成为文化研究最重要的课题。而综合归纳各学科的文化研究成果，探索文化的普遍问题和现实意义，也正是现当代文化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门学科的兴盛，既是时势需要，也要条件允许。如何构建和发展文化学，一百多年来一直是文化研究者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问题。但是，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迫切需要一门探究文化普遍问题的综合学科，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有充分的条件建立起这门学科。^②特别是当今世界正处于

① 郭齐勇：《文化学概论》，18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② 陈建宪：《文化学教程（第二版）》，30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文化软实力竞争、全球信息化和文化经济发展的时代，文化问题日益突出，文化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焦点。知识、信息和人的文化创造力价值得以凸显，各种新兴的文化群体和文化现象不断涌现，使得人们对文化经济、文化实践、文化价值观以及文化社会中人的生存方式和意义进行深刻反思和研究，对人类文化的未来走向进行前所未有的探索——这就不仅要求文化学对文化的普遍问题和突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解决文化基本原理及其构成机制与当代经济、社会实践、创新力等层面之间的关系；更需要文化学真正成长起来，从其他学科的附庸地位中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有这样，文化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能量，以巨大的光芒闪耀于世界科学的舞台之上。

第二节 文化学在中国

一、文化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

文化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这对我国学术界也提出了挑战。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文人、学者们对文化的探究起步很早，这为建构文化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我国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曾掀起过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论战，集中讨论了文化问题。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有不少学者专事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哲学和文化史的研究。同时，西方构建文化学学科的思想也深深地感染了中国学者，黄文山、阎焕文、朱谦之等开始倡导建立文化学。^①

中国有许多学者热心于文化，这些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研究传统文化，如梁漱溟、林语堂等人；另一类是借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文化，如吴文藻、林惠祥等人；还有一类是侧重于研究文化学理论，如黄文山、司马云杰等人。此外，还有介于其间的学者，如陈序经、费孝通等人。

中国早期的文化学研究者，在学科思路上一度追随西方的步伐，大量引进、介绍西方文化学成果，并结合本土文化特征进行了一些研究。

^① 郭齐勇：《文化学概论》，19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